

# 忠县涂井崖墓的时代与相关问题

钟 治

(绵阳市博物馆 四川绵阳 621000)

韦 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The Cliff Tombs at Tujing, Zhongxian County have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The dating was said to be around Shu state according to the coins found in the tombs. However, based on the funeral objects and tomb patterns, these tombs should be around Shu State and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Zhongxian Tujing Cliff Tombs Shu State to Eastern Jin Dynasty

**内容提要** 忠县涂井崖墓群颇受学术界关注,发掘简报根据其部分墓葬中出土的蜀汉钱币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为蜀汉时期,其实,根据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和墓葬形制来分析,该墓群应属于蜀汉至六朝早期。

**关键词** 忠县 涂井崖墓群 蜀汉—东晋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忠县涂井崖墓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重庆市忠县发现的一处墓葬群,墓群位于忠县东北数十公里的涂井溪的附近,涂井溪由北向南流入长江,墓地所在的地理位置重要而交通便捷。当年发掘的墓葬共有 15 座,因部分墓葬中出土有蜀汉时期的铜钱币,发掘简报遂认为这批墓葬的时代都为蜀汉时期<sup>[1]</sup>。由于这批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较大,而且内涵丰富,是已经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被认为属于蜀汉时期的墓葬,特别是其中的 5 号墓,保存完好,出土的陶俑即达数十件,部分是所谓的白毫相俑,因此,这批墓葬颇受学术界关注,经常将这批墓葬作为蜀汉时期的标准墓葬,用以比定研究其他墓葬,还有学者撰写了相关学术论文<sup>[2]</sup>。事实上,出土蜀汉钱币的墓葬只有数座,而且钱币标明的是墓葬的时代上限,因此这批墓葬的时代是否定都为蜀汉时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由墓葬时代的差异引发的其他问题也需考虑。

简报认定出土蜀汉钱币的墓葬有 4 座,它们是 M5、M7、M13、M14,其中 M5 和 M7 可靠。M5 出土的是“平五铢”、“太平百钱”、蜀“五铢”,M7 出土的是“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M13 和 M14 则不可靠。简报中称两座墓葬出土的最晚钱币是蜀“五铢”,由于简报中没有具体提供每座墓葬出土钱币的拓本,据现有资料无法断定 M13 和 M14 出土的是否确实为蜀“五铢”,而且,蜀“五铢”的判定标准本身也并不十分明确。理论上来说,M5 和 M7 都出土了蜀汉钱币,那么两墓的时代在蜀汉或蜀汉以后,但实际情况要复杂些。M5 和 M7 都是前后室墓,M7 没有给出平面图,只能以保存完好的 M5 为例剖析。M5 前室发现二、后室发现一环首长铁刀,简报云:“在前后室长铁刀一侧残存红漆皮和黑色板灰。漆皮残迹长 1.70、宽 0.40 米,板灰厚 3~4 厘米。可能为红漆木棺朽痕。从随葬长铁刀和银手镯、顶针、发钗来看,此墓的葬具当置



1



2



3



4

图一// M5出土陶俑

1. 124号俑 2. 126号俑 3. 130号俑 4. 131号俑

墓道。”简报根据上述迹象所作的判断是可信的,类似的布局在很多东汉魏晋墓葬中反复出现。从平面图看来,不仅有三具棺木,而且随葬品也可以分为以棺木为中心的三组。后室的一组不论,前室以编号 119 的铜钱堆为界可分为两组,前室左侧(面向墓道为准)即 119 号铜钱堆东侧(墓葬方向近正北向)棺木的随葬品,也即简报中所称的前室左侧角和左壁下有:铜壶、釜、洗、铁釜甑、青瓷碗、陶屋和各式陶俑。这组随葬品比较简单,不仅没有陶屋,而且与另两组随葬品有一定差异,其一是青瓷碗,二是陶俑的样式有别。青瓷碗编号 113,是 M5 中唯一的一件瓷器,弧壁,底内凹,这种样式的青瓷碗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于东吴西晋。这件青瓷碗灰白胎,施青绿釉,胎釉结合紧密,有细冰裂纹,不是来源于长江中游即来源于长江下游。虽然不知 M5 出土钱币的具体位置,但这件青瓷碗应是 M5 中时代特征最晚的一件器物,前室左侧棺木和随葬品应最晚进入 M5 这座合葬墓。

10 件,编号为 124~133、135,其中 4 件的服饰比较特殊,它们是 124、126、130 和 131(图一)。124、126、130 分别为听琴俑、抚琴俑和舞俑,3 件俑的共同特征是制作比较粗陋,面目不够和蔼,头冠上装饰 3 朵 7 或 8 个角的大花。其余两组随葬品中共有陶俑 55 件,仅一件即 68 号的头冠为 7 角大花,因此,推测这种头冠上装饰大花的陶俑是后起的样式。左侧随葬陶俑中除 124 号为听琴俑外,129、131 也是听琴俑。以冠帽正面的花瓣装饰为准,129→131→124(图二)似可排成一系列,129 花瓣细碎,多达 16 瓣,131 为 9 瓣,124 为 7 瓣,而且 124 的 3 个大花瓣与冠帽很不相称。129 号陶俑的冠帽花瓣样式在 M5 中较为多见。重庆化龙桥的一座简报认定的东汉墓葬中,女俑都是这种样式的冠帽(图三)<sup>[3]</sup>,说明这种样式一度相当流行的。抚琴俑也是如此,M5 中同样也有冠帽装饰细碎花瓣的,如 98 号,与 126 号成为显著对比(图四)。于此可见,124、126、130 号与 129、98 号等样



1



2



3



图二// M5出土陶俑

1. 129号俑 2. 131号俑 3. 124号俑



图三// 重庆市化龙桥墓出土陶俑和器物

式的陶俑之间很可能存在时间差。青瓷碗与陶俑都显示 M5 前室左侧的随葬品内部之间在时代上有一定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差别,这组的时代要比其他两组晚。M5 前室中部有一堆铜钱,颇难断定属于左侧或右侧墓主,或许兼属于二者,而且 M5 的“平五铢”、“太平百钱”和所谓的蜀“五铢”的具体位置不明确,给推定各组的时代带来一定困难。

目前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文字钱属于前室左侧墓主,那么前室左侧部分的时代当在蜀汉或更晚,其他两组的时代有可能属于蜀汉,也可能属于东汉晚期;如果文字钱不属于前室左侧墓主,那么其余两组的时代有可能属于或晚于蜀汉,前室左侧部分的时代当更晚。M5 的前后室墓顶一次作成,三组棺木和随葬品的时间应不会相差太大。总之, M5 的时代跨度有可能自东汉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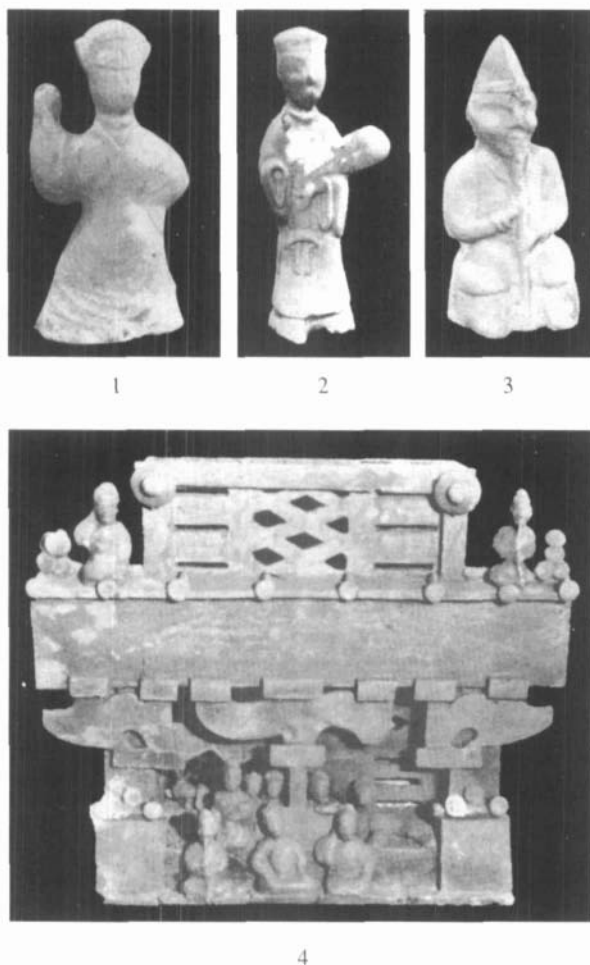
期至于西晋前后,而不必一定为蜀汉时期。

类似的情况存在于 M13, M13 与 M5 的结构和棺木放置方式 M5 很相似,后室虽被盗,但前室也是分为左右的两具棺木,棺木前方的随葬品有一定差异,具体的界线虽不明确,但也可能存在时间差。随葬品中的陶器有东汉晚期的特点,又有一件瓷洗,是长江中下游东吴西晋时期流行的样式,因此这座墓葬的时代跨度与 M5 一样,也可能自东汉晚期至于西晋前后。M14 与 M13 都出土所谓的蜀“五铢”,但两墓的情况有所不同。M14 是一座单室墓,出土品为陶器、陶俑和铜器。发表的 3 件陶俑都有东汉时代的特征(图五),其中两件的女舞俑和尖帽胡人吹箫俑。女舞俑编号为 M14 :19,头戴冠帽,左手叉腰提裙,右手上举,右腿微伸,这种形象的女舞俑常出于比较肯定的东汉墓葬中,忠县附近也有出土,如崖角墓地 99ZGYCM16、97ZGYAM3<sup>[4]</sup>。冠帽的样子象用一块布包裹好头发后,又用带子将其扎结为三部分,中间部分大而两侧小。M5 :35 女舞俑的造型身姿与 M14 :19 几乎一样,但冠帽上已装饰花瓣。前述涂井 M5 的听琴、抚琴女俑的冠帽与此大同小异,不过是在上面有加饰了花瓣而已,这样 M14 :19→M5 :35、129→M5 :131→M5 :124(图六)的头部装饰似可以联成一发展线索,经历了从朴素向华美再简陋的演化。尖帽胡人吹箫俑是东汉墓葬中的常见形象,忠县附近也有出土,如崖角墓地 02ZGSM9<sup>[5]</sup>。保存完好的涂井 M5 中已没有单个的尖帽胡人吹箫俑,但在建筑模型上有这个形象。涂井 M5 建筑模型上有成群的人物,形象比较程式化,与出土的陶俑有一定差异。尖帽胡人吹箫俑是其中重要的形象之一,或许说明尖帽胡人吹箫



图四// M5 抚琴俑

1. 98 号俑 2. 126 号俑



图五// M14陶俑与M5陶质建筑上的胡俑  
1. M14女舞俑 2. M14执物俑 3. M14胡人吹箫俑  
4. M5陶质建筑和胡俑

俑在M5的时代已经蜕变为“历史”形象。M14的男执物俑的帽子上部高起,形成“屋幘”,涪陵东汉墓中出土与此俑形象几乎相同的陶俑,还出土带“屋幘”帽、跏趺坐击鼓的陶俑<sup>[6]</sup>,可知“屋幘”帽是东汉时期流行的样式。涂井M5的男性陶俑中,没有一件戴这种“屋幘”帽的,有不少带平顶冠的,其中的一件男抚琴乐俑也不例外,看来,东汉流行的“屋幘”帽后来逐渐变化为平顶了。M14发表的材料虽然有限,但从陶俑来看,墓葬具有较多的东汉时期的特征,与M5有一定的时间差距,M14、M5前室右侧和后室,M5前室左侧构成时间上前后关系,而且器物之间存在发展序列。M13也可以归入这个序列,详见下文。

如果不借助于钱币和瓷器,上述几座墓葬可能都会被笼统地归为汉墓,而无法深究彼此之间

的细微差异。上述墓葬中,瓷器只是个别出现,另有其他几座墓葬,瓷器出现的数量较多,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首先有必要述及的是M6(图七),这是一座多室墓,但器物与他墓都不相类,瓷器有明显的东晋时期特征,表现在盘口壶较瘦高,唾壶垂扁腹大平底,碗带较矮的实圈足,这些特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东晋瓷器的典型特征。而据现今研究成果,三峡瓷器几乎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M6的时代只能在东晋时期。M6的陶器数量不多,但较有特点,特别是四耳罐M6:6,在涂井崖墓的陶器中很不一般,类似形状的瓷罐很多,推测这件陶器模仿了瓷器。M2、M9、M15(图八、九、十)可以归为一组,瓷器时代早于M6。M2出土瓷器有敛口曲腹碗、折腹碗、釜,M9出土有斜直壁碗、四系罐、蛙形水盂,M15出土有折腹碗、弧腹实圈足碗、四系扁罐、盘口壶,这些器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于东吴中后期至东晋早期,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墓葬的大致时代。M9和M15中还出土了一些陶器,器物特征与M6明显不同,而与M5有相似之处,特别是陶罐存在相近关系,甚至M13的陶器也可在此一并说明(图十一)。敛口圆肩罐M5、M15都有,看不出形式上的差异。折肩折腹陶罐中M13:1为一种形式,器形较高,下腹转折不明显,M9:15、M5:110、M15:4为另一种形式,器形变矮,因下腹转折明显而底部变小。实际上,折肩折腹陶罐是东汉时期三峡地区很流行的一种陶器,在忠县就多有发现,这种罐与陶仓和陶井的井罐有时容易相混,其特点是近直口直壁平底。M9、M5、M15的罐在东汉时期也很常见。M13的罐在涂井墓群中为仅见,此外M13还出土高圈足的陶壶,这也是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M13的这两件器物的时代看来要早于M9、M5、M15。M13的这两件器物都出土在前室的左侧,看来左侧器物群的时代要早于M5,而可以暂且与M14归为同一阶段。M13左侧器物群的时代当然要早于右侧,但是由于材料公布限制,右侧器物群与M5的前后关系现在还不能推定。

根据上面的论述,现在可以归纳出下面具有时间上前后关系的几组墓葬或器物群:

- 1、M14、M13左侧器物群
- 2、M5前室右侧、后室器物群
- 3、M5前室左侧器物群
- 4、M2、M9、M15
- 5、M6

其中,第1~4组存在渐变关系,陶器、陶俑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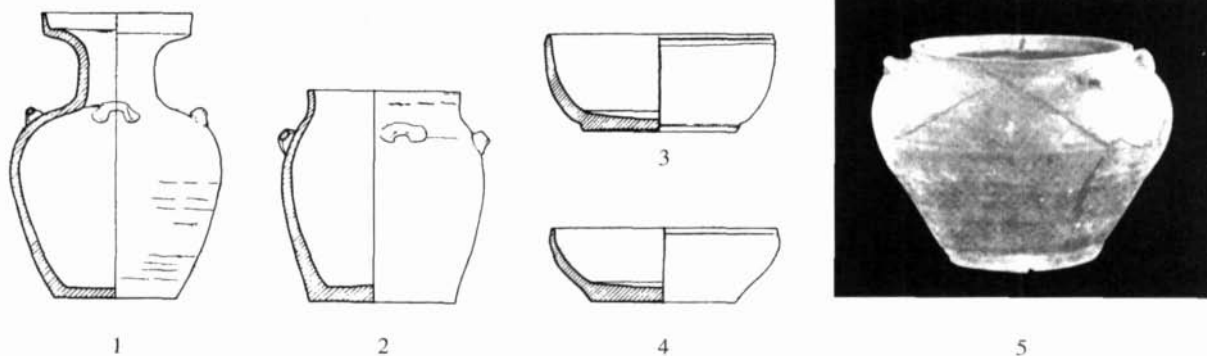


图六// 陶俑头饰演化示意图

- 1. M14:19
- 2. M5:35
- 3. M5:129
- 4. M5:131
- 5. M5: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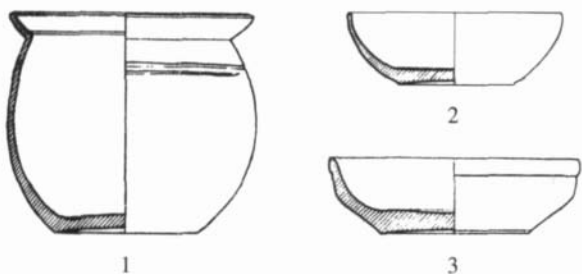
的先后提供了条件。四组之间的承上启下的关系相当明显,如果抛除瓷器这个舶来品,四组之间的本地因素之间的起承转合更为清晰。虽然现在尚不能确定每组的绝对时间,但是四组墓葬或器物群存在于东汉晚期至东晋早期应可确定。在这个

东汉、蜀汉、西晋、成汉,如果加上东晋的话,共五个历史时期,在如此频繁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墓葬面貌能够保持如此的连贯性,是值得深思的。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巴蜀地区,就会看到这种连续性是普遍存在的。巴蜀地区已经发现的蜀汉西晋的



图七// M6 出土器物

- 1~4. 瓷器
- 5.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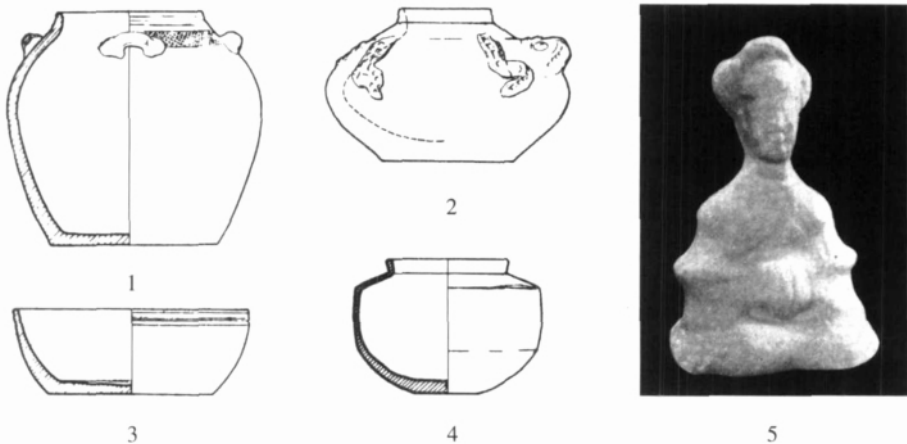


图八// M2 出土器物(皆为瓷器)

纪年墓葬不多,已知者仅有西昌南坛村墓(建兴三年,225年)和成都扬子山(泰始十年,274年)墓<sup>[7]</sup>,西昌南坛村墓几乎没有发现随葬品,成都扬子山墓的随葬品也所剩无几,瓷罐、碗是长江中下游东吴西晋时期的风格,值得提出的是墓门用两块大石板做成,石板表面雕刻相对的拥彗执盾人物各一,这完全是一派东汉气息。另有巴县白市驿、大邑县董场乡、崇庆县五道渠墓、城固县宝山小学<sup>[8]</sup>等几座墓葬出土有三国时期的钱币,确定了墓葬的时代上限,简报中都将它们直接断定在蜀汉,虽然证据不完全充分,但时代也不至于相去太远。巴县白市驿墓长凸字形,出土“直百五铢”、“定平一百”铜钱,陶人物俑、陶镇墓兽、陶猪、鸡等,与东汉时期几乎没有差异,简报云“该墓虽构式一般,为川东一带东汉墓式之常见者,然在重庆地区蜀汉时期,全国(“郢”误?)楔形砖构之券顶、室壁、三层墓底,这是首次发现”。大邑县董场乡墓非常残破,只保留不少画像砖,内容据考有神荼郁垒、六博舞乐、西王母、建木、车马出行、天仓、天阙、方相等,这些内容完全承东汉而来。墓中出土的五铢钱,简报认为是曹魏五铢,简报还认为:“墓墙错缝平砌,墓底铺地砖两层,墓砖略较汉砖薄小,砖纹变得简单等,均与1981年四川省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相似。而且画像砖的浮雕线条变细变浅;天仓画像砖上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三国的人物造型等,均说明这座墓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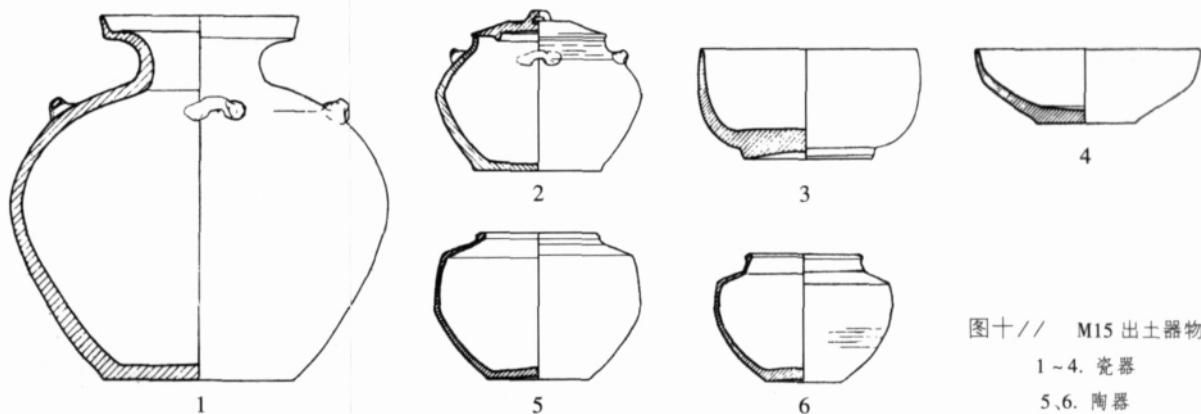
三国时期的墓葬……。”这些论述可资参考。崇庆县五道渠墓出土有“直百”和“直百五铢”两种铭文的铜钱,器物有铜釜、灯、陶罐、灯等。铜灯作玄武状,见于东汉晚期至东晋早期的墓葬中,如开县红花村墓、涪陵崖墓、大邑马王坟墓、南京仙鹤观东晋墓<sup>[9]</sup>等。城固县宝山小学墓出土物不多,但其中有“定平一百”380枚。

从蜀汉到东晋早期,巴蜀地区的墓葬面貌与东汉晚期墓葬有连续性,忠县涂井墓群将这种连续性明确地表现出来,它与这个地区的历史应有密切的联系。蜀汉、西晋和成汉虽然也有动荡,但巴蜀地区的局势总体上相当平稳<sup>[10]</sup>。蜀汉代刘焉、刘璋,西晋代蜀汉,基本都没有触动当地的社会基础。如何协调与巴蜀豪强大姓的关系,是外来势力进入巴蜀后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刘焉入蜀后,一度与巴蜀地方势力剧烈冲突,但过了一个阶段,就主动协调同当地强势阶层的关系。蜀汉建立时,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董)和、(李)严、(黄)权,本刘璋授用也;吴懿、费观,璋之婚亲也;彭莱,璋所排摈也;刘巴,己之宿恨也;皆处之显位,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sup>[11]</sup>西晋灭蜀后,虽然将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地主集团的主要人物共约三万余户,内迁到洛阳关中,但继续对蜀汉大臣及其子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一定的优待。原巴东太守罗宪降魏后领原职、拜凌江将军,原蜀汉降都尉霍弋降服后续任原职、并遥领交州刺史,是其显例。西晋还引用一部分蜀中豪族大姓人士如柳隐、文立等为官<sup>[12]</sup>。据《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巴蜀地区西晋时期人口约100万,与蜀汉相差无几,可见社会的稳定。成汉时期的情况,正如《晋书》卷一二一



图九// M9 出土器物

1~3. 瓷器 4、5. 陶器与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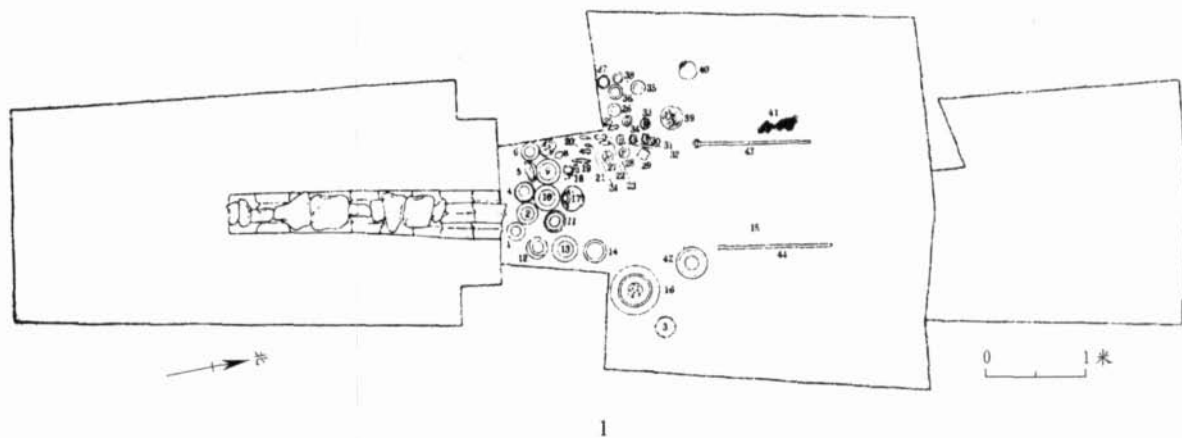
图十// M15 出土器物

1~4. 瓷器

5、6. 陶器

《晋书》所载：‘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阊门不闭，无相侵盗’<sup>[13]</sup>。从蜀汉到成汉，也即相当于曹魏至西晋阶段，中国各地的墓葬文化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异，这也是外来力量数度进入巴蜀，而巴蜀地区墓葬面貌没有大变的重要原因。

第 5 组与前四组之间存在突变关系，陶俑、东汉特点的陶器、六朝早期的瓷器在第 5 组中都不复存在，由于 M6 的时代可以明确地断在东晋，因此，可以说，东晋早期前后是涂井墓群的重要转变阶段，根据发表的三峡地区的其他材料可知<sup>[14]</sup>，涂井墓群具有比较典型的墓葬断代方面的意义，



图十一// M13 平面图与出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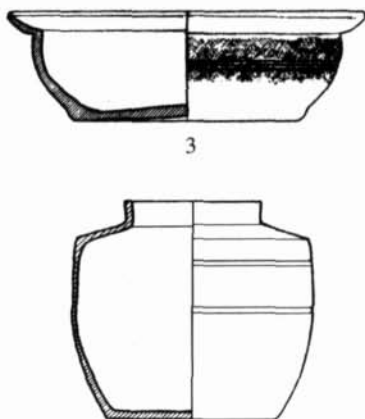
1. 平面图

2. 瓷器

3、4. 陶器



2



4

东晋早期前后是三峡地区墓葬面貌普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还可知,长江中下游六朝墓葬在东晋前期发生剧烈转变,这与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有密切关系。东晋建都建康后,一扫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西晋的墓葬文化传统,代之以简约但具有时代特色的丧葬文化,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反复地表现出来。东晋前后以涂井墓群为代表的三峡地区墓葬面貌的普遍转折,不能不让人联系到东晋永和三年(347年)的桓温入蜀。从蜀汉以来一直延续的丧葬文化传统,在新的文化因素挟政治势力而来之际,大概不得不面临调整。由于史料的不足,巴蜀入东晋之后的情况不十分明了,但明确可知桓温入蜀以后巴蜀地区进入连续动荡不安的时期,历经东晋、前秦、谯纵、南朝宋、齐、梁、北朝西魏、北周八个政权的统治,这不能不对三峡地区的各个方面包括丧葬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三》载梁州(包括四川东部和陕西汉中等地)民户15516,其中四川境内者仅4000余户,口不足2万,如此稀少的人口,必然对社会生产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

影响三峡地区生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少数民族——僚和五溪蛮的的迁徙和散布。蜀汉后期开始,原云南贵州一带的僚人开始入蜀,成汉时大规模入蜀,入蜀后的僚人遍布巴蜀全境,这个问题与桓温入蜀一道,对当地的社会和生产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建国中,李氏在蜀,诸僚始出巴西……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sup>[15]</sup>东晋殷仲堪谈及巴西、宕渠二郡时说:“巴西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所有。”<sup>[16]</sup>与二郡相邻的三峡地区情况恐也不容乐观。民族迁徙和散布甚至在南朝时期仍然没有停止。主要居住在湘西武陵山一带的五溪蛮,南朝时期进入川东,“蛮者,盘瓠之后……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陋落尤盛,余则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号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sup>[17]</sup>根据近年来三峡工程过程发现的墓葬可知,忠县涂井崖墓所显现的东晋早期前后开始的墓葬特征,南朝时期仍然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忠县崖墓群的学术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和评估。

物》1985年第7期。

- [2] 贺云翱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文物出版社1993年;吴桂兵:《忠县涂井M5与蜀地佛教早期传播》,《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魏藏:《从汉陶人物俑看汉代四川社会》,《文史杂志》2006年第4期。
- [3] 胡人朝:《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 [4] [5] 北京大学三峡考古工地发掘品,资料现在忠县。
- [6] 涪陵博物馆藏品。
- [7] 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晋代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
- [8] 李国良:《巴县白市驿发现蜀汉砖室墓》,《四川文物》1994年第5期;大邑县文化局:《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王寿芝:《陕西城固蜀汉墓葬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崇庆县文化馆:《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第8期。
- [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显双、开县图书馆朱士鸿:《四川开县红花村崖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涪陵东汉崖墓清理》,《考古》1984年第12期;丁祖村:《四川大邑县马王坟汉墓》,《考古》1980年第3期;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第3期。
- [10] 蜀汉降晋时户28万,口94万,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巴蜀22万余户,与蜀汉相差不大。巴氏李氏成汉政权建立过程中,曾产生一定的民族对抗或逃亡,但随着成汉政权的稳定,局面有所改善。《华阳国志·序志》云:“李氏据蜀,兵连祸结,三州倾坠,生民殄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黑之窟,宅栖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常璩成汉时官散骑常侍,为永和三年(347年)劝李氏降晋的主要人员之一,《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时距成汉亡不过8年,因此常璩的叙述容或夸大,不尽可信。
- [11] 《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
- [12] 蒙默等编:《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 [13] 《晋书》卷一百二十一《李雄载纪》。
- [14] 可参见几座纪年墓葬,如巴东老场屋M3(泰和四年,369年)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姊归老坟园M5(泰元五年,380年)见《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巫山江东嘴M9(太元六年,381年)见《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
- [15] 《魏书》卷一〇一《僚传》。
- [16] 《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
- [17] 《周书》卷四九《异域志·蛮传》。

[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